论隋唐司法监督制度的定型

张赞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隋唐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法律制度体现出了中国古代文明全盛时期的风范: 体系完整, 结构严谨, 制度严密, 轻重得宜, 影响广泛。由于有近三千年的立法、司法经验作基础, 隋唐的司法监督制度日臻完备、定型。隋唐司法监督制度在世界法制史上谱定了辉煌的篇章, 对后世和东亚一些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为后世封建法制的典范。

关键词: 隋唐 司法监督制度 定型 封建法制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隋唐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从夏代以后, 经过近三千年的积累, 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已经成熟, 各种社会体制也进入了比较和谐的阶段。所以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顶峰。这个时期的法律制度也体现出了中国古代文明全盛时期的风范: 体系完整, 结构严谨, 制度严密, 轻重得宜, 影响广泛。由于有几千年的立法、司法经验作基础, 隋唐的司法监督制度日臻完备、定型。

1、隋唐司法制度的发展、完善

1.1 司法机构的系统化

由于隋律的亡佚, 关于隋朝司法制度的资料不够完整, 但从《隋书》等有关史料来看, 与秦汉以来的司法制度相比, 隋朝的司法机构有了较大变化。首先, 中央司法一分为二: 大理寺和刑部。大理寺为中央司法审判机关, 以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 掌依法鞠狱。刑部为司法行政机关。刑部原为都官部, 受尚书省统辖, 以尚书为长官, 侍郎为次长。开皇初定其所辖为都官、刑部、比部、司门四司, 将与司法无关的部门去除。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 改刑部为主司, 从此刑部成为尚书省六部之一。刑部和大理寺分掌司法, 在中国司法制度发展史上首次出现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分立的现象, 具有重大意义。其次, 地方司法机构职权划定。虽然地方司法经历了由州县改郡县的变化, 但集行政职能与司法职能于上身的地方机构改革, 为加强皇帝对各级司法机构的控制铺平了道路。而且在司法上规定地方无权判处死刑, 而将这一权利收归中央, 有利于慎刑原则的进一步发展。

隋代御史台在司法中的地位是不明确的, 从法定程序上讲, “御史台不受词讼, 有通词状者, 立于台门, 侍御史、御史竟往门外收采, 如有可弹者, 略其姓名, 皆云风闻方知。”

(1) [卷二十四]可见御史台仅为监察弹劾机构, 不是司法部门。

唐朝总结了以前各朝的司法经验, 建立了比以往更为系统、完备的司法机关, 包括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

中央司法机关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组成, 它们不仅各有机构、职责, 还存在一种互相配合、制约的关系。简称“三司”。

大理寺是唐朝中央的最高审判机关。其长官叫大理寺卿，副职叫少卿，属吏有大理正、大理丞等，主要职责是：负责审判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但是流、徒刑案件判决后须经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判决后须奏报皇帝批准；负责审核由刑部移送来的地方死刑案件。

刑部是唐朝的中央司法行政机关，其长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属吏有郎中、员外郎等，负责主管全国的司法行政事务，并负责复核大理寺判决的流刑以下及州县徒罪以上案件。在复核中，如有疑案、错案，对徒刑以下案件可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或者自行复判；对死罪案件可转交大理寺重审，上奏皇帝批准。

御史台是唐朝的中央监察机关，掌有司法监督权，其长官称御史大夫，副职为御史中丞，属下有若干御史，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也参与审判，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唐朝的中央司法机关既有明确分工，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甚至互相制约。其中，突出表现在：大理寺主审判，刑部主复核，御史台主监察；还有，它们共同审理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等。

刑部复核大理寺的审判，就有一种制衡作用，可以督促刑部依法审判，避免或减少错案。根据《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刑部先行使了这种复核职能，而且不只是书面复核，还到监狱核查其它一些情况，说：“天下疑狱藏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奏报不驰驿。经而决者，刑部岁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阅狱囚桎校、粮饷，治不如法者”。

御史台的监察范围很广泛，包括了百官的所有违法犯罪行为。监察大理寺、刑部官吏的违法行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御史台的官吏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他们的监察行为与百官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这种意义上说，御史台对大理寺、刑部官吏的司法监督应是有力、有效的。不过，御史台官吏的监察也须依法进行，他们如有违法犯罪行为也会被弹劾。

唐中期以后，中央或地方每遇重大疑难案件，由皇帝特诏组成临时特别法庭，由大理寺会同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共同审理，叫做“三司推事”。这种联合审判制度是后世“三法司”的前身。

唐朝中央司法机关的建制、职责及一系列规定，对唐朝以后中央司法机关机制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朝的中央司法机关几乎是唐朝的翻版，元、明、清虽有改变，但仍不离其宗，还是三大部门，而且同样是互相独立和互相制约。^{(2) [P627]}

中国古代地方行政与司法是不分的，唐代地方司法也由行政机关兼理，实行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制度，但是，专门掌管司法诉讼的属吏、僚佐则较前代有所增加。

唐朝的地方政权是州、县两级制，州县是主要地方行政机关。县是最低的一级行政机关，也是最低级的审判机关。“凡诸词讼，皆从下始”。⁽³⁾县为司法诉讼程序的第一审级，县令总管一县行政，也是一县的司法官，要亲自处理司法事务。《旧唐书·职官志》载：“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敦四人民之业，崇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县令也有其佐官：丞、主簿、尉、司户、司法、仓督、典狱和问事等。其中的司法、典狱等都处理司法事务的官吏。县下有乡、里、村等基层组织，分设乡正、里正与村正，负责地方治安，并有权处理轻微的刑事案件与调解田土、婚姻等民事案件。

县以上是州、府，一般的行政区是州，京兆、河南、太原为府，军事要冲设都督府，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设都护府。府尹、州刺史、都督、都护都是地方行政兼司法的负责长官。刺史每年巡视属县一次，录囚徒，察狱讼，纠察属僚，对疑狱、冤狱则申报尚书省，或直接报告皇帝本人，对下属具有广泛的监督、检查和惩处的职能。州、府都设有很多佐官，包括别驾、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录事和司功、司仓、司户、司法、司兵、司田、司士曹参军事等。其中的司法参军事和司户参军事都掌有具体的司法职责。司法参军事“掌律令格式，鞫狱定刑，督捕盗贼，纠逖奸非之事，以究其情伪，而制其文法，赦从重而罚从轻，使人知避而迁善远罪”；司户参军事的职责是：“凡男女婚姻之合，必辨其族姓以举其违。凡井、田利害之宜，必止其争讼以从其顺。”⁽⁴⁾由此可见，唐代地方州县，尽管行政与司法是不分的，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却是有别的。

1.2 诉讼与审判制度的完善化

隋文帝时，开始对南北朝以来野蛮的诉讼审讯制度进行改革。文帝针对其“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车辐、压踝、杖桡之属，楚毒备至，多所诬服”的现状，下诏：“尽除苛惨之法，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不得易人。”对地方受理的诉讼案件，本人认为有枉屈者，县不受理，可逐级经郡、州，直到尚书省，甚至可“诣阙申诉”，“听挝登闻鼓”。⁽⁵⁾隋代的这些规定，都被唐朝所继承，并使诉讼与审判制度更趋完备、成熟，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 起诉

刑事起诉是刑事审判的前提，唐代在刑事起诉制度方面已自成体系，其结构之严密，内容之丰富，勘为前代法制的又一集大成者。根据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可将唐代的起诉分为两种形式：举劾和告诉。举劾是由监察机关和各级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类似近世的公诉。唐律规定，凡监察机关或各级官吏对重大案件的犯罪，该纠举而不纠举或不及时纠举，均要负刑事责任。告诉，是指由被害人方面向官府提出控告，揭露犯罪人和犯罪事实，并要求依法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告诉即近世所谓的自诉。为防止告诉产生损害封建伦常关系的反作用，唐律对告诉权有如下限制：第一，除谋反、谋大逆、谋叛等罪外，卑幼或奴婢不得告尊长或主人；第二，在押犯人或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一般亦无举告权。凡无告诉权人举告的案件，司法官不得受理，否则，要被处以“减所理罪三等”的刑罚。此外，唐代严格了告诉的各项程序，规定告诉必须自下而上，由县至州，再由州至中央。对于越级告诉，以及官府受理者，规定了“各笞四十”的处罚。⁽⁶⁾

(2) 审讯

司法机关接受起诉书或举劾书以后，便传讯当事人，应该逮捕拘提者应立即逮捕拘提。凡逮捕来之犯人，应戴上刑具，加以关押。

审讯时，为防止审判官因亲属或仇嫌关系故意出入人罪，〈〈唐六典〉〉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肯定了司法官的回避制度，即所谓“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回避制度极大地保证了审讯和判决的公平性与合法性。

唐律要求官吏审讯必须“依状鞫狱”，⁽⁷⁾即依诉状所写的事项进行审讯，不得追究诉状以外的事项，否则以“故入人罪”论。但是，如果有人检举或发现另有其他罪的，不在此限。

唐代的审讯以众证定罪，口供是判决的主要证据，所谓“罪从供定”。唐代的证人证言制度，对证人出庭作证作了严格的规定，凡80岁以上、10岁以下及患有不治之症的笃疾者，缺乏作证能力，不得作证。唐律强调“亲亲相隐”的礼教原则，凡是犯人亲属不得要他们作

证。唐代实行“众证定罪”原则，要三人以上证人作证才能定罪，所谓“三人证实，二人证虚”。为了取得口供和证言，秦汉以来，封建王朝一直确认刑讯制度的合法性，唐律亦允许对被告人和证人使用刑讯手段，但对刑讯手段的使用，却作了严格限定。《断狱律》规定：“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时，要“立案同判”，然后才能拷讯。即参与审判的各官，须办理刑讯的手续后，方得拷问案犯和证人。拷讯必须用常行杖，每隔 20 日进行一次，拷打三次为止，总共不得超过 200 杖，中间不得换人行刑。此外，对享有议请减免等特权的贵族官僚及老、少、废疾、孕妇，不得进行拷讯。违反上述规定的司法官要受到刑事处罚。

(3) 判决

唐律规定，司法官吏依据被告和原告两方的口供以及人证物证，即可对案件作出判决，在判决时，必须具引律、令、格、式的正式条文定罪、判刑，如无正文时，依《名例律》规定：“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同时，司法官吏要准确地运用法律，不得出入人罪。所谓出罪，是指把有罪判为无罪，或重罪判为轻罪；所谓入罪，是指把无罪判为有罪，或轻罪判为重罪。无论故意或过失出入人罪者，都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规定对于限制司法官吏权力的滥用和保证当事人的利益起了一定的作用。

唐代司法审判一审结束、定案后，徒罪以上的判决，按《断狱律》“狱结竟取服辩条”的规定，必须要“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辩。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就是说要当面向囚犯及其亲属宣告其所犯的罪名，听取犯人对判决的意见。如被告人认罪，则当场签写“服辩”，以免反复；若不服则可提出申诉。

(4) 上诉

唐律规定：被告人如果确有冤滞的，在一审判决后可以提起申报：先由原审机关重审，申诉后原审机关不予改判的，即可逐级上诉。不服县判决的，可上诉到州；不服州判决的，可上诉到尚书省，由左右丞相详审；可向三司直到皇帝申诉。“凡有冤滞不申欲诉理者，先由本司本贯，或路远而蹶碍者，随近官司断决之。即不伏，当请给不理状，至尚书省左右丞为申详之。又不伏，复给不理状，经三司陈述。又不述者，上表。”⁽⁸⁾为防止诉讼人对下级审判机关的蔑视及给审判工作带来混乱，一般情况下，唐律不准越级上诉。

在唐代，除了上述一般程序的上诉制度外，还有一种非常上诉程序即“直诉”，又叫“告御状”，即当无辜者被冤，而且冤抑很重并无处申辩的，可以直接向皇帝申诉。当时直诉有四种形式：一是“挝登闻鼓”，即在东西两京城门外悬一只大鼓，申诉冤屈者可击鼓直诉皇帝，要求复审。唐律规定：“挝登闻鼓不实，杖 80；主司即不受理，加罪一等。”二是“邀车驾”，即在皇帝出巡车驾经过时，拦路喊冤进行申诉。但申诉不实也要处 80 杖的刑罚。伸冤者只能在仪仗队外俯首陈告，若冲入仪仗队内，杖 60。三是“立肺石”，即的冤者站在朝堂门外的赤色石上进行申诉，因此石色赤如肺而得名。四是“上表”，直接向朝廷上表章，披陈冤情。另外，武则天执行时期，还有一种名为伸冤甕的直诉形式。武则天命人在朝堂设置四个铜匣，名曰“甕”，其中“伸冤甕”，收受诉状，并设有“理甕使”这一官职负责处理诉状。^{(2) [P661]}

(5) 执行

对判决的执行，是诉讼程序的最终阶段。

唐代以刑罚的不同有不同的执行规定：笞、杖刑的判决在县执行。但妇女怀孕判笞杖刑者，须待产后一百日方能执行。徒刑的执行，在京师的男犯将送作监，女犯送少府监劳役。

在州县者送当地官府服劳役。判流刑者，要立即押送到配所劳役，如稽留不按时送到，有关官吏要处笞三十至徒二年的刑罚。死刑应在奏请皇帝批准后三日依法定方法执行，应处斩刑的处了绞刑，或者应处绞刑的却处了斩刑，处司法官一年徒刑，死刑一般公开执行，由御史或当州官员监决。死刑应在有肃杀之气的秋分季节后执行，否则要处司法官一年徒刑。对怀孕妇女死罪的执行，规定在产后百日，若未产而行刑者，徒2年；产讫限未产而行刑者，徒1年。若行决死刑时，监决官发现“囚有冤枉灼然者，停决奏闻”。⁽⁸⁾

从上述诉讼审判制度可看出，唐代虽然没有单行的专门诉讼法典，但其诉讼审判的每一步骤都是在法律制约下进行的，可以说已经制度化、法律化。

2、御史监察制度的成熟、定型

隋唐的御史监察制度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典范，表现了承上启下的传统风格色彩，也表现了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而进行的制度建设之精雕细凿。它不仅有效地保证了唐封建吏治的清明，而且这一时期确立的御史台独立制度、台分三院制度等均被明清所沿用，使优良的监督体制传递后世，发挥作用。隋唐时期，御史监察制度的成熟、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御史监察系统的统一与监察职权的扩大

御史台的长官从东汉至隋以前，一直是御史中丞，而不设大夫，隋避“中”字讳，改中丞为大夫。下设治书侍御史二人，代中丞之职，侍御史八人，主要负责察举中央文武百官。殿内侍御史十二人，主要负责翰朝会时纠举百官失仪。监察御史十二人，主要是监察地方上文武百官之违失。隋和唐初，其职权仅限于揭发纠举并不参与司法审判，“但风闻弹事，提纲而已。”自贞观以后，御史台始参与审判。

唐初沿隋制，设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管全国监察工作，但名称曾几度更换，高宗龙朔二年改为“宪台”，武后光宅元年分为左右，称“左右肃政台”，左台监察京师百官，右台按察诸州，后来又合而为一，改为御史台。御史台设御史大夫一人，正三品，为长官，设持书侍御史为副。贞观末，为避高宗李治讳，改持书侍御史为御史台的正副长官。“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中丞为之贰，凡天下之人，有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讯之。凡中外百僚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大事则方幅奏弹之，小事则署名而已。”⁽⁹⁾察行政与司法两大系统官吏之违失，以整肃朝纲，加强吏治。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关，除弹劾百官外，也参与司法审判，监督府库出纳等事宜。可见，它是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机构。故唐睿宗说：“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实由此焉。”^{(10)[卷100]}

唐代御史台组织机构进一步扩大。所辖御史分为三类，相应地设立三院，为三类御史的各自办事机构。在职权上分工明确，整齐划一，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完善阶段。

台院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设侍御史四人，从六品下，“掌纠举百僚，推鞠狱讼。”下设主簿一人，从七品下。录事二人，从九品下，以及其他属官四十余人，分掌台务。台院侍御史的主要任务是纠弹中央百官，并参与大理寺审判重大案件或由皇帝制敕交付的案件。侍御史在御史中地位最高，职权最重，多由皇帝直接指派亲信担任，或由宰相与御史大夫商定，由吏部选任。凡弹劾必由大夫、中丞画押书奏，以示事权之统一。

殿院

殿院设殿中侍御史六人，从七品下，令史八人，书令史十八人。殿中侍御“掌殿庭供

奉之仪式。凡冬至、元正大朝会，则具服升殿。若郊祀巡幸，则于卤簿中纠察非违，具服从于旌门，视文物有所亏阙则纠之。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内之有不法之事。”主要是纠弹百官在殿廷违法失礼之事，以及皇帝出巡仪仗、服具是否合于制度等。

察院

察院设监察御史十人，正八品上。太宗贞观初，曾吸收一些年轻资浅者充任御史，如马周以布衣进用，太宗令于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因其资浅，先在御史里行走的意思，类似近世之见习生。监察御史“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岑南选补、知太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监察祀则阅牲牢，省器服，不敬则劾祭官。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凡百官宴会、习射，亦如之。”主要负责监察地方官吏之过失。

唐代御史台总监察之大权，下设台、殿、察三院，机构完备，人员编制固定，分工合理，各自职掌明确，自成一个系统。这对秦汉以来监察机构设置不一，统属紊乱、职权不清的状况是一个重大变革。从此，监察机构基本定型，统一完整，职权清晰，体制健全，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宋、元等朝代的一台三院制及三院御史的分工都是沿袭唐的制度。

概括而言，唐代御史的主要职责如下：第一，推按狱讼。包括推问皇帝下达的案件即诏狱，审理普通百姓的案件，参与三司推事等。第二，劾奏犯罪。即对违法犯罪的官员进行纠举，弹劾其罪行，请求司法机关审判。第三，巡察内外。一是分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监督其行政行为，使之合法而有效率；二是巡察州县，遇有非法行为，便予以纠查。第四，监督决囚。大理寺决罚囚徒时，御史要与中书舍人金吾将军一起莅临，如发现司法机关违法及犯人有冤者，予以纠举平冤。第五，监察录囚。由此可见，唐代御史监察机构的职权也有重大的变化：除了继承秦汉以来纠察百官、弹劾不法的历来职能外，在监察权方面，开始确立了对尚书六部的监察权，并大大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察。秦汉以降，监察机构的监察重点一般是官吏个人，对政府机构、部门的监察则很少有。唐代御史台分察六部说明这时已从对官吏个人的监察，开始转向重视对机构的监察。德宗时御史中丞韦贞伯弹劾吏部选曹乖谬，结果吏部主要负责人皆坐削一阶就是一个实例。⁽¹¹⁾ [卷一三二] 御史台分察六部制度的建立，加强了监察系统对行政部门的监察，这是中国监察制度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经，并给后代很大影响。宋代监察御史分察六曹，明代六科给事中独立分察，都起源于此。

2. 地方监察制度的完备与崇重

秦时设监御史巡察郡县，汉代实行刺史监察郡县制度。东汉末年，由于刺史发展成为掌有军、政、财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无法实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地方割据势力嚣张，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十分薄弱且屡屡中断。隋唐时代，重新建立并发展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在制度的规定方面，有很多变革和创新，在地方监察官员的品秩、地位和配备方面，都比以往更为重视和完备。

隋唐中央王朝统治者对地方的监察均十分重视。隋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沟通中央与地方的联系，隋朝在地方建立了司隶台和谒者台，监督地方官吏。文帝仁寿年间，令遣持节者巡行州县，“察长吏能不”。持节使即司隶台的前身。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三月，建立司隶台，“掌诸巡察”，隋的地方监察机构由此得以健全。炀帝还另设了谒者台“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驾出，对御史引驾。”⁽¹²⁾ [卷二十八] 谒者台掌握对地方的监察权，使秦汉以后临时性的遣使巡察制度化，成为唐代巡察使的前身。隋朝对地方的监察重点与汉代较相似，也以考察品官理政能力和纠察贪残害政为主，但监察的范围有所扩大。

唐朝中央对地方州县的监察，除了御史台不定期派遣御史出按州县外，最主要的创新就是十道巡察使的派遣和成为制度。十道巡察，是中央对地方州县的一种经常性的巡回监察

制度。担任十道巡察的官员，除御史外，其他官员也可以担任。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依“山河形便”将全国划分十道监察区，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¹³⁾[卷一九二]自贞观至垂拱年间，经常派遣大使巡行各道，起先不按十道分遣，天授以后，十道巡察成为定制。玄宗时增至十五道。每道派监察御史一人，后来叫“巡按使”、“按察使”、“采访使”或“观察使”。监察御史下设判官二人佐之。十道巡察使的创设，使唐朝对地方的监察制度趋于完备。

唐代御史、巡察使巡察地方按“监察六条”进行。据《新唐书·百官志三》载：“一察官人善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三察不劝农桑、仓库耗减；四是察奸滑盗贼、扰民生业、蠹害百姓；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能，贤士隐居者；六察奸吏豪强兼并土地、暴虐百姓，贫弱冤苦之人不能申冤者。”第一条察官人善恶，第二、第三条则察户口、籍帐、赋役、农桑、仓库这些封建政权赖以维持统治的基础。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是为了征收赋税徭役；察农桑不勤是为了重视农业生产，以便增加封建国家的国库收入；察仓库减耗，则是为了保持并不断增大对农民的榨取，以供统治者军、政所需有及挥霍浪费之用。唐代对黠吏豪宗的监察则放在最末一条。将唐代的“监察六条”与重视对地方豪强监察的汉代“监察六条”作比较，可发现，唐代由于地方豪强势力的衰落，便将地方监察的重点从政治监察为主逐步走向政治、经济监察并重，经济监察的成分大大超过了前代，尤其是汉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经济的发展和地方监察职能的健全。

3. 御史行使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和规范性

为了保证御史工作的独立性，防止宰相等官吏牵制、干扰御史行使弹劾权，隋唐时期改变了北魏以来由御史台长官选任御史的制度，而改由吏部选任。而在实际中，监察御史自唐高宗永徽以后，“多是敕授”，即由皇帝直接选任。御史在执行任务时，凡弹劾，不需要预先报御史台长官。史载“李承嘉为御史大夫，谓诸御史曰：‘公等奏事，须报承嘉知；不然，无妄闻也。’”监察萧至忠徐进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权，岂有奏事先咨大夫，台无此例。设弹中丞，大夫岂得奉谏耶？”承嘉无以对。”唐至德元年，肃宗明令“御史弹事自今以后，不须取大夫同置”。建中元年德宗再重申：“御史得专弹劾，不复关白于中丞大夫。”⁽¹⁴⁾[卷六十一]在国家机构中御史为“风霜之任，弹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¹⁵⁾御史台在行使权力时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也不是没有法度，而是有其规范性。《唐六典》对御史台及其三院的职权有具体的规定，它们各自职掌明确，不得越权。武则天三次想把御史中丞宋璟调离京师，宋璟三次“请不奉制”拒受武则天诏令。第一次要宋璟巡按扬州，宋璟根据《唐六典》监察御史掌“巡按州县”的规定，认为：巡按州县是监察御史的事，不应由御史中丞管。第二次宋璟去幽州调查审理都督屈突仲翔的贪污受贿案，宋璟推辞的理由是：“御史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且仲翔所犯赃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监察御史，今敕臣，恐非陛下之意，当有危臣，请不奉制”。第三次要宋璟随李峤作为特使出使蜀地，宋璟认为有特别的事变才须派遣特使，现在陇蜀之地并无特殊事变，而无事派遣特使是违背朝廷制度的。⁽¹⁶⁾[卷二]可见，唐代御史台行使职权，是以《唐六典》为主要依据的，规范性强，这种规范性的效用有时甚至超过皇帝的诏令。御史的权力很大，但并非无所制约，亦受“四善二十七最”法、“六察法”等的考察、监督。而且对各院御史，严格考核制度，“监察御史以二十五月为限，殿中侍御史十八月，侍御史十三月”。成绩好的，如“四推鞠狱，两弹举事，皆无败阙，方得转迁。”⁽¹⁷⁾[卷五十三]御史如有违法犯罪行为也会被弹劾。《新唐书·百官志》载：左右丞“掌辨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这种对监察机关的内控措施，反映了唐朝监察制度的进一步完备和成熟。

在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合一的体制下，司法监督属于行政监督的一种方式，但因司法的特殊职能和其相对独立的体系结构，司法监督又具有特殊的监督范围和特殊的制裁方式。

御史台作为隋唐的中央监察机关，掌有司法监督权，是司法监督的主体。其所进行的司法监督包括内部监督、外部监督两个方面。内部监督指对司法系统内部官员及其司法行为进行的监督，典型的如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复囚、监决等。外部监督主要指对行政官吏的监督，它是通过对违法失职的官吏开展刑事制裁而完成的。在所有的对行政机关实施监督的方式中，司法监督以刑罚制裁的方式来纠正行为人的过错，是最强有力的监督方式。

唐代御史台的司法监察权，保证了监察机构对司法机构的监察。解决了大量存在的冤狱和滞狱，通过复审、谳狱和录囚、举劾等实施司法系统内的监督和检查，既是慎刑的具体措施，也是对司法官员司法行为的有效控制，这些制度的规定使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审慎从事，依法断案。

总的来说，整个唐代吏治清明，执法比较宽大简约，政权也相对比较稳定，维持近三百年，不能不说与御史台司法监察权的建立和实行有一定的关系。唐朝实施改良封建法制的政策和方针，有力地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同时，亦在世界法制史上谱定了辉煌的篇章，对后世和东亚一些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封建法制的典范。

参考文献

- [1] 通典职官六·御史台[M].
- [2] 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隋唐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 [3] 唐律疏议·斗诉·越诉[M].
- [4] 唐六典·州县官吏[M].
- [5] 隋书·刑法志[M].
- [6] 唐律疏议·斗诉[M].
- [7] 唐律疏议·断狱[M].
- [8] 唐六典·刑部>[M].
- [9] 唐六典·御史台[M].
- [10] 唐大诏令集[M].
- [11] 新唐书[M].
- [12] 隋书[M].
- [13] 资治通鉴[M].
- [14] 唐会要[M].
- [15] 文献通考·职官考[M].
- [16] 大唐新语[M].
- [17] 文献通考[M].

A Discussion on Finalized Design of Judicial Surveillance System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Zhangyun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Southwest's Borderland Ethnic Minorities of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ere a prosperous time of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Legal system of this time manifested styles during the heyday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That is, system was integrity, structure was rigorous, system was strict, weight was appropriate, affects were wide. On the basis of experiences of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with nearly 3000 years old, judicial surveillance system was complete and finalized design day by day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Judicature surveillance system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has decided magnificent chapter in history of world legal system. And it ha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 and some countries in East Asia. It became the model for later feudalism legal system.

Key words: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Judicial Surveillance System, finalized design, feudalism legal system

收稿日期: 2005-07-08

作者简介: 张贇 (1973-), 女,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史。

(责任编辑: 晓斌)